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问题研究》丛书

中国特色 论

許毅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问题研究》丛书

许
毅
著

中 国 特 色 论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卢元孝
责任校对：徐领弟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潘泽新

中国特色论

许 毅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北京毕诚印刷厂印刷

三佳装订厂装订

880 × 1230 32 开 16.75 印张 410000 字

2004 年 12 月第一版 200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58-4463-6/F · 3735 定价：3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我国当前最大的国情，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经过近 25 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已初步建立。但与此同时，随着形势的变化以及对外交流的日益增多，社会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理解产生了一些模糊认识，在坚持马列主义根本立场的问题上出现了或僵化或盲目学习西方、鼓吹自由化的错误思潮。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都有着极大的阻碍作用，只有及时地正本清源才能顺利实现党中央制定的未来发展战略。

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能变，但是它的具体应用要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做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创新。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规律，两者的相互适合也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一定条件下适

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慢慢又会不适应于生产力的新发展，两者总是在动态的发展中获得平衡。在学术研究领域，这种动态的发展过程同样是客观存在的。人的认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新事物的不断涌现而逐渐向前发展的，具体到这本书中收入的文章而言，它们既是紧紧围绕着中国特色论这个中心议题而展开，同时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在学术研究领域不断深入实际、与时俱进的客观反映。

本书是改革开放以来本人围绕着中国特色这个研究中心取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内容涵盖财政、经济、政治、社会、历史等领域，从国家分配的角度剖析了再生产诸环节中有关方面的问题、经济与财政的关系以及历史的有关演变发展过程，揭示了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对于当前现实问题的重要影响。全书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研究方法，对如何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又结合时代发展不断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文明成果和发展经验，从而建设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解答。

近年本人年事已高，虽一直思考不辍，但因眼疾无法提笔写作，书中文章大多由我的学生和助手执笔整理完成。

本书是本人的一孔之见，欢迎各位读者指出其中存在的不足，并共同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以期为我国早日全面迈进小康社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前 言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财政理论问题内容众多，在一本书里无法一一论及。为此，我们将围绕着这个中心议题陆续出版这套丛书的其他分册，欢迎各位读者予以关注。

目 录

绪言：问题的提出

- 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建国 55 年来我国经济与财政建设历程概览 (2)

中国特色的国情论

- 论“两声炮响”与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
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关系 (40)
- 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
生产方式形成过程的特殊性 (72)

中国特色的财经史研究

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和研究财经史的方法	(90)
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的几点意见	(102)
研究历史规律,把握经济与其他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	
——以革命根据地建设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史的研究为例	(115)
以史为鉴,打破中国历史上社会发展的盛衰周期律	
——兼谈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123)
近代中国外债及其二重性研究	(15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在新的台阶上	
建设新世纪的中国	(188)
学习邓小平理论 把对外开放事业发展推向新高峰	(202)
牢固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217)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阶段下必须充分发挥市场	
机制和价值规律的作用	(230)
市场经济条件下“看不见的手”与宏观调控	(24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发挥资本纽带作用	(249)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途径	(278)
论三农问题与农业生产方式革命	(294)
安徽阜阳市农村税费改革问题调查报告	(312)
农业产业化与城镇化的几个问题	(321)
充分发挥现有城镇功能 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	(343)

统筹兼顾 富国裕民

- 兼论分工协作与全国一盘棋的关系 (35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论

- 财政学基础理论的理论基础 (368)
- 建立广义财政学的倡议 (387)
-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学初探 (408)
- 从社会再生产角度出发, 重塑财政学理论体系 (443)
- 对国家、国家职能与财政职能的再认识
- 兼评公共产品论与二元结构论 (456)
- “三个代表”与公共财政 (474)
- 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国家职能和财政职能, 发展
- 和完善“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论” (492)
- 坚持马列主义原理, 借鉴西方经济管理理论 (502)
- 浅谈虚拟资本与泡沫经济 (506)
- 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共财政理论体系
- 与实际工作规范 (514)

绪言：问题的提出

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 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建国 55 年来我国经济与财政建设历程概览

自秦统一中国直到清朝的“康乾盛世”，农耕经济时代一直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康乾时代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由于“盛而骄，富而奢，奢而贪，贪而腐，腐而朽，朽而亡”，从而受到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使中华民族遭受了百年的屈辱，也使人民负担日益沉重，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自 1840 年到 1949 年，各民族仁人志士经过百折不挠、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终于获得了全民族的解放，打碎了旧世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到建设新世界的时代。

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我们花了 50 多年，终于建立起一个新世界。我们将在党领导下迈向小康社会，并在 2050 年争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个时代，是中华民族最为伟大的时代，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的，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近 55 年的建设，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 25 年，尤其是近 13 年来的成就尤其突出。但是，历史从来都是连贯地发展的，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成就与新中国几代建设者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

当前我们得以集中精力建设市场经济也是与计划经济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打下的雄厚基础分不开的。只有很好地总结过去，才能明白今天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也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下面，本文将对新中国 55 年历程中的各项成就和不足，尤其是经济建设领域的成就和不足进行一个粗略的总结，以便为接下来认识当今的时代形势，制定相应的政策方针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一、新中国的建立基础以及社会主义特色的来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没收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旧中国官僚资本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也是以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特色为基础的。历史上，封建的上层建筑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引进机器工业，进行原始积累，通过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利用私人资本，同时也利用外债。以上两种原始积累的方式造成了中国资本主义本身的软弱性和依赖性。与西方产业革命过程中同时改造了小生产的情况不同，此时的中国的产业革命及资本的运用主要集中在铁路、矿山、军工等领域，农业、手工业小生产没有得到改造，为以后的中国社会留下了小生产的汪洋大海。

与中国资本主义相比，旧中国官僚资本的产生特色更加明显，并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发展。中国的官僚资本从金融领域起家，上层建筑利用金融手段对全国的经济进行控制，与一般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不同，近代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金融不是因产业资本发展的需要而生，而是首先从金融垄断开始，逐渐发展到工业垄断和各行业垄断，最终形成四大家族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没收了四大家族的官僚

资本，使之成为新中国公有制经济基础以及工业化发展的第一个来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了在东北的经营，以逐步实现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侵略政策，随着日本侵华程度的加深，日本控制与掠夺的资本在华的投资扩展到关内。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对日在华资产进行没收，这是新中国公有制经济基础以及工业化发展的第二个来源。

抗战胜利后，美国在中国实行“假调停、真内战”的策略，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新中国成立后，英美资产阶级政府对中共新政权采取敌视态度。一方面，美国操纵联合国一再否决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依靠其太平洋军事基地和台湾对我国大陆实行军事包围，并进而发动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一方面又在经济上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并没收我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为了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我国没收了英美在华资产，这部分资产成为我国公有制经济基础和工业化发展的第三个来源。

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并要求全党做到“两个务必”，也就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提出了“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的论断，并豪迈地提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在政治方面，新中国成立的主要依靠力量有三个，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二是广大农民，没有广大农民踊跃参军同时在后方发展生产，我们

战胜旧政权就没有可靠的基础，三是各民主党派的爱国人士，他们紧密地围绕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革命不遗余力，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毛泽东同志 1949 年 6 月 30 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最后，他指出，“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这段讲话明确表明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以经济工作为重点建设好新中国的决心和信心。

新中国成立之时，除了国民党运往台湾和存在海外的资产外，中国大陆留下来的资产全部转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占有了这个基础，又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的金融、铁路和邮电，所以产生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这个经济基础所产生的上层建筑，则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与此同时，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局限，中国广大的农村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没有得到改造，虽然在一定领域内已经拥有较为先进的大机器生产，但新中国建立时小生产的比重仍占国民经济的 90% 左右。

二、从新中国建立到“一五”计划胜利超额完成

新中国建立前夕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三年里，主

要任务是贯彻《共同纲领》，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和建立完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由于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生产萎缩、物价飞涨、城乡隔绝、财政困难、失业严重，以及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禁运，使得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一开始就遇到了巨大挑战。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曾积极地恢复和发展与西方的经济关系。1950年上半年，新中国与北欧的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英国也进行了建交谈判，与美国的经济贸易往来恢复得也很快。但是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同时期，美国在国务卿顾问杜勒斯的导演下，同日本签订了把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都排除在外的“对日和约”，一步一步暴露了它要用武力来阻挠中国解放台湾的目的。由此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对中国报以敌视态度并从东西南三面对新中国进行封锁，使中国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1952年8月，杜勒斯又提出了所谓的“解放政策”——用政治战、心理战和宣传等手段，通过宣传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等，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和平演变”，使这些国家获得“自由”。他还明确提出：“共产主义是一个致命的危险”，美国及其盟国的责任是：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用和平的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为此，他在1953年成立了新闻署，直接支持、领导“美国之音”，同时加强“自由欧洲电台”对苏联、东欧的宣传，插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事件。来自外部的威胁使得新中国不得不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加强国防作为首要任务，同时在外交上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并在经济上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策。

蒋介石集团在败逃台湾时已经把大陆的黄金及外汇储备全部运往了台湾。建国之初，当时的资产阶级提出共产党“军事斗争一百分，经济建设零分”，他们一方面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一方面拒用人民币，妄图在经济上搞垮新中国政权。面对这一严

峻形势，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领域运用价值规律和市场手段与资产阶级展开了斗争。1949年9月，成立了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负责指导一切有关经济部门的工作，国家通过经济手段打击经济投机，禁止金银买卖来扩大人民币流通范围。1950年3月，中央政府决定统一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在财政方面实行统收统支，从而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通过与资产阶级的市场斗争，通过对粮食、棉花、煤炭等物资的市场垄断经营，国家统一了混乱的市场，凋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统一财经对于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和控制市场、稳定物价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使国民经济迅速走上了正轨。同时，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发行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并得到了苏联政府3亿美元的贷款支持，从而以举债的方式缓解了财政困难和建设资金的不足，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

1950年10月的“镇反运动”达到了改革国营企业中的旧制度、清除企业内部的反动党团组织和反革命分子的目的。与此同时，广大农村开始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土改工作，本着“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有组织”的原则，全国于1952年基本完成了土改工作。

由于生产能力的限制，加上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外部市场不足，1950年我国的财政收入仅有62亿元，1952年GDP只有679亿元，同时当时还面临着全国只有29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却要供养全国5.7亿人口的严峻形势。从1952年7月初到1953年6月底，城市粮食收支存在着40亿斤的缺口。为了保障供给，国家于1953年10月采取了粮食统购统销的措施，随后又在食用油、棉花、棉布等领域也采取了包括发票证在内的一系列计划经济措施来组织正常的经济生活。

1950年上半年党和政府“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两个

战役的胜利，为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奠定了基础，使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具有了良好的宏观环境。但是旧中国长期的经济畸形和统一财经刹车过猛造成了1950年4月以后出现了市场呆滞、需求不足、城市私营经济处境困难的问题。调整工商业成为1950年党的重大举措，主要内容是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

随着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资本主义占据的市场份额逐渐缩小以及面临着对外市场被封锁的客观形势，为了求得生存，城市私营经济从业者主动提出与公有制经济合作，为国营企业提供加工订货，并进而提出了公私合营的要求，以公私合营等方式实现不同经济成分的联合。1950年国家扩大了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从而既巩固了国营经济对私营经济的领导，也维持了私营经济的生产。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之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年里，合作社有了很大发展，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华东这些解放较早或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为了使合作社走上正轨，1950年7月召开了中华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由薄一波起草经刘少奇修改的《合作社法》。会议提出了“上级社为下级社服务，基层社为社员服务”的方针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下级社服从上级社领导的原则。刘少奇提出当前主要应办农村供销社、城市消费社和城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1952年，全国的合作社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组织系统，形成了全国总社—大区总社—省级联社—市县联社—基层社五级组织，实行了广大劳动者的联合。1951年9月，中央批准了将农业生产互助组织作为中国农村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从此农村中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都蓬勃发展起来，其中以互助组为主体。互助组是在自愿互利、不打破家庭经营核算的原则下，实行平等互利的有偿互助，再加上组织规模小、自由结合、互助方式